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王仁湘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王明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王仁湘 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论文集。收录论文 32 篇,分“考古学与考古学文化”“史前西南区域考古”“史前社会的考古研究”“史前器具研究”“史前彩陶与陶器纹饰研究”五个专题。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民俗等研究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王仁湘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ISBN 7-03-011122-2

I. 中… II. 王… III. 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集 IV. K871.1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6490 号

责任编辑:闫向东 / 责任校对:柏连涛

责任印制:刘秀平 / 封面设计: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 蕾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2 3/4 插页:1

印数:1—1 500 字数:706 000

定价:8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目 录

考古学与考古学文化

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3
崧泽文化初论	22
白家村遗址与白家村文化	56
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前仰韶文化的性质	64
论渭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	76
仰韶文化绝对年代研究检视	84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100
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115
仰韶文化人口与社会研究检视	131
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	141

史前西南区域考古

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	153
从卡若到曲贡	166
四川广元中子铺细石器遗存	187
西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	201

史前社会的考古研究

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性别构成再研究	217
史前捐弃房屋风俗再研究	233
新石器时代葬猪的宗教意义	251
我国新石器时代墓葬方向研究	259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二次合葬及其社会性质	272
文明已不遥远	283

史前器具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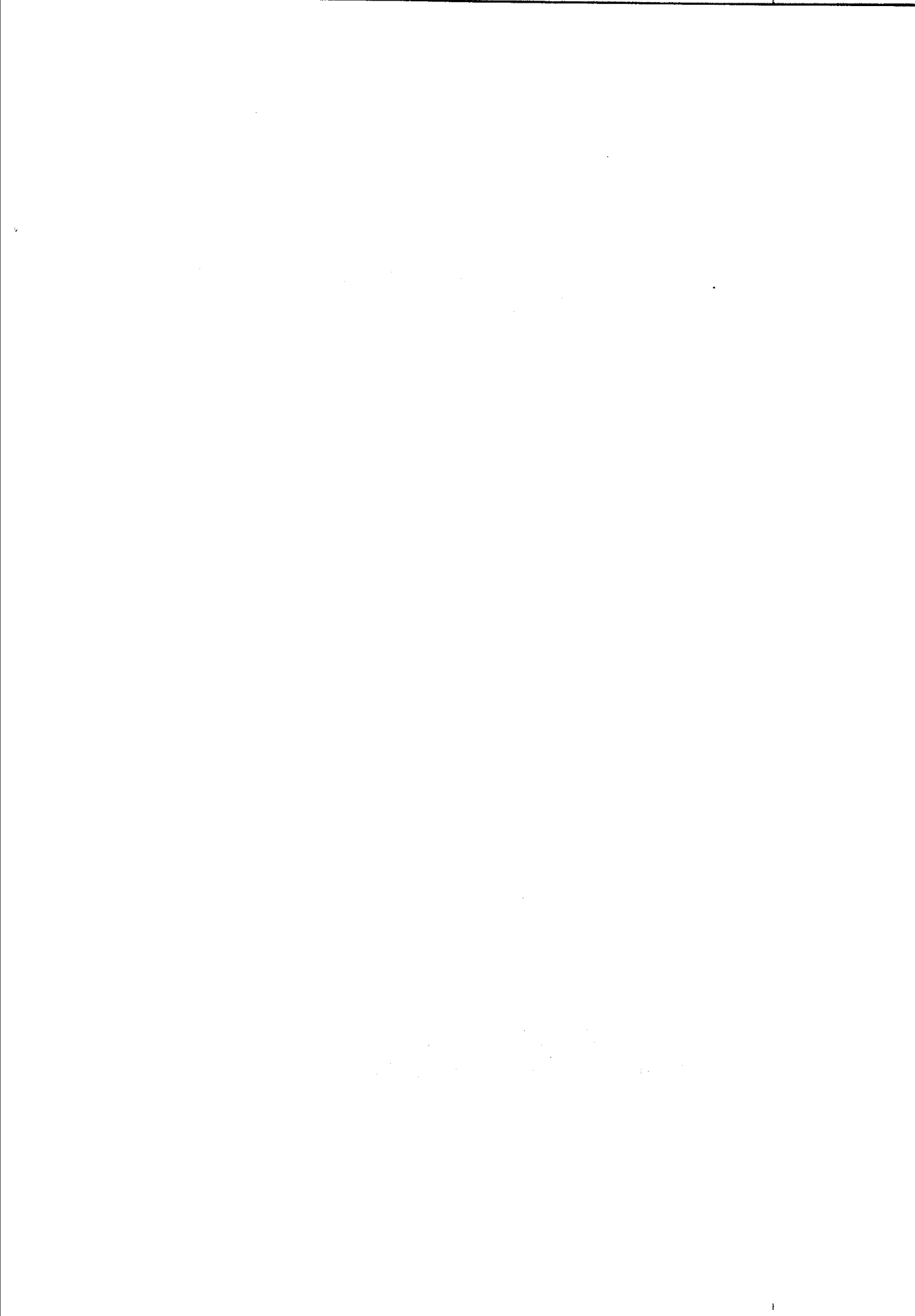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骨制生产工具	295
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双肩石器的几个问题	318
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蚌制生产工具	332
四千年前中国人的系衣束带方式	344

史前彩陶与陶器纹饰研究

史前绳纹陶八题	357
中国史前陶器纹饰区探论	361
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	402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	417
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彩绘花瓣纹图案	451
关于中国史前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	463
中国史前彩陶地纹辨识	491
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	503
后记:无用之用	517

考古学与考古学文化





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进化中的人类，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创造越来越发达的文明，同时也逐渐完善自己的思维，用越来越睿智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一般的人，都可能按时段的不同将这个世界划分为三部分，即往古世界、现代世界和未来世界。虽然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探求这“三界”的天性，但是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如预言家注重未来，史学家探索往古，而大众则迷恋于眼前的世界。不过，无论是侧重于往古或是眼前，人们所关心的显然主要还是未来，只有未来才是希望之所在。尽管未来有时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却怎么也阻挡不住人们强烈的向往，这是人的天性之所在。

探索过去的事物，寻找历史演进的规律，再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对未来世界的进程做出判断，这是人类社会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思维模式。参透眼前的世界就不容易，要探索逝去久远的往古就更是困难了，于是人类社会很早就培养出了历史学家，从事记述和研究历史的使命。历史学也许不会像历史本身那样古老，但在进入近代社会之际，它已经显现出了些许龙钟老态，对所担负的使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人类社会又诞生成长了一门新的学科，这就是到了当代还依然显得有些年轻的考古学。

考古学一开始便承担了探索往古世界的最繁难的那些课题，开拓出传统历史学所不曾涉猎的新领域，考古学家因此成了历史学家的同伴。从此，在探索往古世界的旅途中，行进着一乘轰隆隆的大车，高翔着一只威猛的大鹏鸟。人们喻说历史学和考古学就是这大车之双轮，大鹏之两翼，缺一不可^[1]。在考古学诞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这比喻应当说是贴切的，也是形象的。

假如没有年轻的考古学，我们就不会有现在所知的比较完整比较真切的人类历史，我们甚至对人类自身由何而来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真正明了。考古学诞生于 19 世纪初的西方，20 世纪初才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与在西方一样，经历了大体相似的几个过程。中国考古学，为探索古代中国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为探索华夏文明演进的轨迹，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 20 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回顾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过程，评价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检阅它获得的丰硕成果，推测它进步的趋势，应当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在即将跨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这回顾与展望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将不再年轻，它将迎来自己的盛年。

选自《面向大地的求索——20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一章，原题为“探索往古的年轻学科”。后又经缩写，以“20 世纪的中国考古”为题，在《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2 月 31 日三版）刊发。收入本集文字有删削。

一 从古物学到考古学

在 17 世纪前后的 100 多年间，西方社会古物研究之风盛行。这种研究风气最早始于 16 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当时已有经王室慎重任命的古物学家。古物学向来被认为是考古学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考古学在自古物学中脱胎而出的过程中，还获得过另外一些强劲的助力，例如浪漫主义运动、希腊古物的发现和自然科学的进步，都起到了缺一不可的重要作用。有了古物学的基础，又有了新发现的大批古物；有了更新的精神追求，又有了新的研究方法，考古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研究考古学史的格林·丹尼尔曾经这样阐述考古学在世界上的诞生^[2]：

英国的古物学在 18 世纪之前就曾是一株茁壮的树苗，浪漫主义运动和希腊古物的发现培育着它，直到这棵树长成一棵茂盛的小树，而精心栽种这棵小树的土壤正是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进步。在地质学出现之前，在均变说被广泛接受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考古学。

从古物学发展到考古学，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应当是地质学。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判明埋藏堆积年代的学问，它很自然地移入考古学，自一开始便成了考古学的一大支柱。有学者认为地层学的引入，是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没有它便没有近代考古学，可见地质学对考古学贡献之大。

地层学植入考古学，发展成为考古层位学。地层学一开始便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它被用于判明 19 世纪初发现的人类骨骼、石器与绝灭动物的共存关系，而且帮助研究者认定这些遗存的年代十分古老。在此之前，欧洲发现的一系列古人类化石没有得到承认，主要症结就在于没有引入地层学。古物学没有办法真正解开古代遗物的编年疑难，这疑难在考古学出现之前被形容为一层“穿不透的迷雾”。史前考古学的开拓者，19 世纪丹麦的拉斯穆斯·尼厄鲁普教授在哥本哈根筹办一个博物馆时，就曾苦于无法确定许多古物的年代，他十分感叹地说：“落在我们手中的野蛮民族的所有遗物都裹在一片迷雾中，它们的时代我们还无法度量。可以肯定，它们的年代可以早到纪元初年，但是早一两年，还是早一两百年，甚或是早一千多年，我们对此只不过是揣度一二罢了。”如此的无可奈何，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体会得到。

到了 19 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亨利希·施里曼首次运用层位法发掘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古城，这是考古层位学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它被认为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

当大量庞杂的出土物摆在研究者面前时，受近代生物学的物种分类学的启发，古物学的分类法则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类型学，于是近代考古学就也有了另一个方法论的支柱，逐渐走上了成熟之路。类型学在一开始就运用得比较成功，为重建当时尚不明晰的人类史前史做出了贡献。考古学上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正是类型学研究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最早提出“三期论”划分理论的，是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他在 1813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就曾指出：“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居民所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起初是石质与木质的，这些人后来学会了使用铜……然后才会使用铁。因而这样看来，他们的文明史可以分成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它们之间不可能丝毫不重叠地截然分开。”可惜的是，这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论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几年以后，这个“三期论”才正式运用到古物陈列的实践中，得到学术界的明确肯定。那是 1819 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 C.G. 汤姆森将馆藏文物按照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展出，这一举动被后来者评论为从幼稚的古物学到成熟的考古学跨出的第一步。

1836 年，汤姆森又发表了《北欧古物指南》一书，不久他的学生 J.J.A. 沃尔赛写成《丹麦原始时代古物》，进一步阐述了“三期论”的理论，探讨了器形及装饰风格在史前器物断代上的重要性。这是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开端，是丹麦人对近代考古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丹麦人将古物学家的艺术爱好转变为考古学家的历史研究，这场被称为“古物学的思想革命”的革命之所以发生在 19 世纪之初的丹麦，据认为与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有很大关系。“丹麦人是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开始研究自己早期历史的，所唤起的是人们对自身历史、语言和民族性的浓厚兴趣，民族精神可以从深思中汲取力量，在记忆中发现一种同样辉煌的全新纪元的希望”^[3]。是丹麦人，还有后来的瑞典人，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奠定了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建立起了相关的理论与方法，完成了古物学向考古学的革命性转变。

在西方诞生的考古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夏鼐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做过简要回顾，他将这个过程划分为萌芽、形成、发展和继续发展几个时期，阐述如下：

萌芽期（1760~1840 年）。考古学随着一些新学科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古物的发现引起各方面追寻历史的热情。18 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考古学的成长，拿破仑的远征军中有学者同行，在埃及遍访古迹和古物；拿破仑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大肆掠夺古物，后来在法国建立了陈列这些掠夺品的博物馆。著名的庞贝城址的发掘，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释读，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形成期（1840~1867 年）。丹麦学者关于石器、铜器和铁器“三期论”的提出，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英、法两国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埃及、西亚、希腊、罗马大批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田野发掘还处于很不科学的状态。1866 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考古学会议，是近代考古学向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成熟期（1867~1918 年）。考古类型学研究受到重视，史前考古学系统化，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方法，田野调查和发掘开始科学化。考古学从欧洲、北非、西亚扩展到东亚和美洲。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特洛伊城址、赫梯文字、美洲玛雅文明，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国外陆续有探险队和发掘人员进入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掠夺古物。

发展期（1918~1950年）。考古学理论有很大发展，发掘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运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开始起步，并且很快取得重大成果，北京人化石、安阳殷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

继续发展期（1950年至今）。是前一阶段的深化与发展，理论探讨和科技方法的应用都有明显进展。“新考古学派”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引起了考古学的反思。中国考古学迅速成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从萌芽到成熟，再进一步发展，考古学同许多学科一样，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过对考古学各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研究者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确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俞伟超在1990年为译著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所写的“序言”中^[4]，将全球考古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期、成熟期和新时期，他对此作了如下评述：

考古学的萌芽期，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当时为推翻中世纪的黑暗制度，人们要寻找一个新的世界，试图建立一种新秩序。人们很注意搜集古罗马、古希腊的艺术品，好似发现了一个比中世纪要美妙得多的新世界，于是美术考古发展起来了。后来随着地理学的发展，人们的兴趣又转向其他古物和古迹，开始对古物进行系统分类，于19世纪初有了石器、铜器和铁器三段分类法，古物学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美术考古的兴起和古物学的进步，奠定了近代考古学发生的基础。

考古学的成熟期，指的是所谓传统考古学发展时期，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其两大方法论支柱。考古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进的，类型学则承自古物学，是由生物分类学最早得到的启示。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家都主要依靠这两种方法，在两河流域、埃及、亚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建立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序列。

考古学的新时期，以20世纪60年代“新考古学派”的出现为标志，新考古学突破了传统考古学纯物质文化研究的旧框框，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十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制约作用。“这个学派的哲学基础是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目标是了解人类行为的过程，探索人类行为的进程和动力”。新考古学派虽然受到传统考古学的抵制，确也有待改善，但是，“无论从其研究目标还是解释方法而言，新、旧两派是愈走愈近而不是愈走愈远”。考古学的发展也正是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考古学自19世纪初在西方古物学基础上诞生，至今已走过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比起历史学等古老学科而言，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发生要晚出一个多世纪，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在世界考古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考古学虽然更加年轻，但有更深厚的根基，它的发展更有希望。

二 从金石学到考古学

一个满怀信心的人对自己年少时代的回忆，常常会令他津津乐道，这回忆会伴随

着他坚实的脚步，直到永远。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对自己久远历史的回味，则会是一种永不衰减的兴致，这历史是民族进步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通常一个民族对早期历史的追忆，往往要通过传说乃至神话来实现，而那些迷蒙的古老传说，对后人来说常常是一团难以穿透的迷雾，一个个难以解开的谜。传说不会是信史，传说也不可能保留下完整的历史，要了解人类走过的漫长历程，不仅要解开传说留下的谜团，还要探求传说未能包纳的更多秘密。古今的学人们，文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史家、民族学家、哲学家，都曾经或正在为这种探求做出自己卓越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忘不了历史学家们的努力，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他们了如指掌，正是这些学者将不断更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在学生们面前，让他们诵读，让他们牢记，而且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代。

我们 2000 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有不朽名篇《天问》，他问天地自然，问人世历史，以发问的方式追述了生命的起源、自然的演化、华夏三代的历史，其中有信史，也有神话传说。屈原提出了百多个与历史相关的疑难，却无法一一作答。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其中《五帝本纪》一篇兼采百家之说，追述人类初祖事迹。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考察五帝遗迹，以近乎现代人人类学的艰辛调查，去印证文献与传说的记述。

先哲们的这些努力很清楚地表明，过去的世界并没有完完整整地保留在传说中和诗文里，没有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写入史书中。那些太遥远太古老的故事，被后来的历史或多或少无情地埋没了。

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大地，不仅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还有宽阔的海域，这是我们的先祖生活了数百万年的古老世界。我们作为东方沃土的子孙，虽然承继着古老文明并为之骄傲，但对东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对文明积淀的深厚根基，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还不甚了了，先祖的足迹被历史尘埃厚厚地掩埋着。特别是对文明发轫之初的远古时代，只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保留着片断的记忆，不知道它究竟包容着一些怎样的秘密。

也许是为了防备产生忘却，古人早已注意古物的收藏；又许是为了弥补已经产生的忘却，前人还注意了古物的研究。我们不能忘却过去，我们不能没有完整的历史，所以就有了追寻，有了探索，我们也就有了古物学、金石学，也跟着有了考古学。历史的迷雾也就有了一层层被揭开的希望，忘却的记忆也就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人素有“好古”的雅风，喜收藏，兴赏鉴。早在青铜时代，文物收藏已成传统。殷商大量埋藏用于占卜的甲骨档案，周代王室则多以名器重宝传之子孙。据《尚书·顾命》所述，周康王即位，有宝器陈列，其中有武王诛讨用的赤刀、胤之舞衣、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等。当时周王室还设有宝器管理机构，称为王府和大府。东周洛阳设立的宝器专藏机构，名为“守藏室”，并有“簿录”作登记，其功能已经有点类似于博物馆了。此外在王室宗庙和其他府库，也有文物重器收藏。

秦汉以后各代，帝王宫室都有收藏古物的传统，汉代的天禄、石渠二阁和兰台，

都是文物和图书宝藏处所,《史记·封禅书》说武帝时宫中就收藏有齐桓公铜器。到了晋代,宫中收藏古物的场所称为“武库”,史载武库因一次意外的火灾,烧毁了不少历朝的珍宝,其中包括汉武帝刘邦斩杀白蛇用过的宝剑,还有孔子穿过的鞋子等。从南朝时起,除王室以外,私人收藏也蔚为风气。《梁书·刘之遴传》说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隋代时社会上又兴起了仿古技术,史载有个叫何稠的人巧思过人,他不仅博识古物,而且还精于仿制,作品与真品无异(《隋书·何稠传》)。到了唐代,文物鉴赏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古物辨伪的专家,如一个叫刘蜕的就曾辨识出伪造的“齐桓公铁盃”。

宋代时朝野的古物收藏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哲宗时在长安建有碑林,收集了汉魏以降的大量刻石。宣和年间,宫室收藏文物多至数以万计,士大夫家藏上古三代遗物,往往献于朝廷。保和殿左右分建稽古、尚古、博古三阁,藏古玉、印玺、彝器、礼器、法书和绘画等。宋以后私人收藏之风也愈来愈盛,至清代时涌现出了大批收藏家和鉴赏家,藏品有书画、刻石拓本、玺印、陶文、铜器、玉器、货币、陶瓷、造像和甲冑等,有时一人藏品多至数以万计,还编写有分类目录,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古代学人对传世和出土文化遗物及古代遗址的研究考察,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开始。例如孔子,他曾入鲁桓公庙,观庙中欹器,向守庙者打探它的来历和用途(《荀子·宥坐》)。又如韩非子,对观察到的古物做过时代推断,他说土簠为尧器,彩色土器为大禹祭器,雕琢刻镂的精品为殷器(《韩非子·十过》),说法虽然并不很准确,用现代知识判断,韩非子排定的古物的年代序列却基本是正确的。还有《吕氏春秋》,在五个篇章中都对周鼎纹饰的意义有过揣测,也可以算是对古物的一种初步研究。

汉代的学者不仅重视古物的研究,对古器上的铭刻文字也有了探析,如人们对古文经书的辨识,还有刘敞对出土尸臣鼎铭文的考释。许慎撰《说文解字》,也曾注意到各地出土古器上的“古文”。在《礼记·祭统》中,还可读到关于周鼎铭文意义的论说,留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最值得提到的是,袁康撰《越绝书》,在《宝剑篇》中借他人之口,以工具的质料划分时代,具备了一种“原始考古学”的眼光。袁康将人类历史粗分为石、玉、铜、铁几个相互接续的时代,这与近代考古学最初获得的认识相当接近,实属难得。

汉以后历史上有一次古文献资料的重大发现。在晋太康年间,汲郡人盗挖魏国古墓,出土大量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由于研究者辈出,与这些佚书相关的著作陆续撰出。南北朝时已有一些专门的古物研究著作问世,如萧梁时代的顾恒著《钱谱》一卷,虞荔有《鼎录》一卷,陶宏景有《古今刀剑录》一卷,还有梁元帝的《碑英》百二十卷。有个叫刘景的,还因善于鉴定古物,受到过梁武帝的褒奖。另外有一些非专门性的著作,也涉及古物古迹的研究,如北魏酈道元注《水经》,详记主要水道所经各地的古城、陵墓、寺庙、碑碣等;颜之推的《家训》,则据秦权汉碑,正俗字俗名,有具体入微的研究。唐代时

陈仓有石鼓出土，于是石鼓文的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有一些著录和研究文字刊出。唐代还撰成其他一些重要的古物著录，如封演的六卷《续钱谱》和吴协的《三代鼎器录》等。

中国古代对古物的研究，到宋代时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宋代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整饬纲常，提倡经学，激起士大夫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热情。宋真宗曾几次诏儒臣考证出土的古代铜鼎，对古物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当时的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墨拓技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促成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金石学家评论说，对宋代金石学具有开创之功的是仁宗时的刘敞，刘敞常常往农家征访古器，所获颇丰，他曾将家藏的十多样古器，使匠人将铭文和图形刻之于碑石，同时还撰文提出了初步的古器物研究方法。从此以后，相关的古物研究著作陆续刊行，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一股学术浪潮。元祐年间，有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稍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问世，这是现存年代最早而且较为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比较准确地摹录了所收器物的图形、铭文、尺寸、容量、重量，并注明了比例、出土地点和收藏地点，附有简略的考证，对铜器的定名和用途的推断有不少贡献。宋时还有一些铭文考释方面的专著，脱离器物原形进行了研究。石刻方面的著录也刊印了一些，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类似著录的分类标准有系年、系地、人物几类，研究体系已经形成。对于钱币、玺印、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古物研究范围已经相当广泛。有宋一代，金石学已进入初步兴盛的发展阶段。

金石学研究到了元明时代，进入明显的低谷，成就平平。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两代风尚不重实学，而且金石古器也少有发现，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值得提到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乃贤，作为一个汉化的西域人，在至正年间访古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各地，进行古代城址、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的实地考察，对搜求的古器碑刻进行考订，参验文献记述撰成《河朔访古记》十六卷。他突破了宋以来的金石学家闭门考订铭刻文字的传统，树立了实地调查的学风，这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中国考古学孕育时代的重要文献之一。这时期文物鉴赏方面的撰述，还有元朱德润的《古玉图》、明曹昭《格古要论》等，都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为配合解释经义和整理史籍，金石学（包括古文字学）受到重视，它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出土古器明显增多，涌现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出版了近千种相关著作。清代金石学家如陈介祺、吴大澂、孙诒让等，大都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以往更加广泛，研究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即有专题研究，也有综合研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有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梁诗正等的《西清古鉴》、端方的《陶斋吉金录》、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王昶的《金石萃编》、李佐贤的《古泉汇》、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和冯云鹏的《金石索》等。

至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又有了新的扩展，新包纳进来的主要有甲骨、简

牍和明器等,不再仅限于文字的考订。罗振玉和王国维被认为是这个时期集大成的学者,著述甚丰。由于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各种器物,所以有人主张将传统所称的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有些学者还开始进行学科发展过程的总结性研究。马衡著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研究的成就作了全面总结。马衡(1881~1955年)是现代著名金石学家,与过去那些金石学家不同的是,他比较注意出土文物的现场考察,还主持过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到田野发掘的过渡中,他有推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墨子》有“镂于金石”之语,吉金乐石,勒名示后,为古代帝王的传统。不过以“金石”为学问之名,实际是始于宋代,而到了清代,才明确提出了“金石之学”的概念。金石学注意古物铭刻资料的整理,也强调器类及用途的研究,但基本不进行型制演变方面的探索,也不注意断代分析。它虽然承担了证经补史、辨字补佚的任务,但并未发展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金石学研究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不再以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存在。在一般的研究者看来,实际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传统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结合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金石学对于中国考古学,就像西方古物学之于近代考古学一样,是一个雄厚的基础,也是一个丰实的源泉^[5]。

夏鼐论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认为除了有它的前身金石学作基础,还有西方传来的科学,包括地质学和考古学本身^[6]。西方科学思潮向中国的传播,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而明显加快了速率,一些研究者就认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也与五四运动的推动有关^[7]。

近代考古学在西方诞生半个世纪以后,通过各种途径开始向中国传播。19世纪末,对于西方已经渐趋成熟的考古学,中国的学者们不仅十分关注,而且开始著文介绍。章太炎1900年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论及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研究历史已非典籍一途,地下埋藏的史迹可补记述之不足。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则直接介绍了欧洲考古学家对于古物的石器、铜器、铁器的三期划分法,并将中国古史传说初次按这三个时代进行了比附。梁启超1926年还有一篇讲演,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8],论及考古发掘的重要性,提出要进行“有意识的发掘”,而且要注意方法的改进,并建议在大学设立考古学专科,学习欧人的考古学发掘研究方法。他在这次演讲中谈到“旧方法的改良”和“新方法的引用”,极有远见:

旧方法的改良 例如从前利用器物上的花纹文字,以断定它的年代,这种方法,当然十分精确;不过遇着器物上没有花纹文字,那就没有办法了。今后应当在它的质料、形状、色泽上寻出标准,纵然没有文字花纹,亦可能推定它的年代。

新方法的引用 例如有地质学的知识,可以用崖层状况,以判定时代的早晚;有人类学的知识,可以考出头颅骨骼的派别。这类科学,于考古方面,直接间接,裨益甚大。我们一面要得前人所未得的资料,一面要用前人所未有的方法,从荒

榛断梗中，辟出一块田园来。

梁任公当时所提倡的，已是正统的考古类型学和层位学了。他自己就有一个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的儿子梁思永，他作这次演讲的时候，20岁刚过的梁思永正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近代考古学的输入，除了国内有远见学人的提倡与介绍外，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的直接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阅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附列的“中国考古学年表”，对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察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898~1899年，俄国D.A.克列缅茨率探险队到新疆吐鲁番进行考古发掘，这是外国人首次进入这个领域。

——1900~1901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A.斯坦因率考察队进入中国西北，在新疆发掘尼雅等遗址；斯文·赫定率瑞典考察队，入新疆罗布泊发掘古楼兰遗址。

——1902~1903年，德国人A.格林韦德尔率考察队在新疆库车等地调查发掘；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华北古建筑及云冈石窟；日本大谷考察队调查新疆石窟。

——1905年，日本人鸟居龙藏在东北地区调查。

——1906~1909年，斯坦因二次到新疆等地发掘，骗取敦煌石窟大量写本文书等；法国人伯希和在西北地区调查发掘；日本人桔瑞超在新疆调查；日本人关野贞在陕西、河南和山东地区调查；法国人E.E.沙畹在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山东等地调查。

——1910~1912年，日本人滨田耕作在旅顺发掘汉墓；桔瑞超又到新疆发掘；法国传教士闵宣化调查辽上京遗址。

——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到西北活动，进行大量调查发掘。

——191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创办天津北疆博物院，在黄河流域进行调查；法国人V.色伽兰等在陕西和四川地区调查。

——1918年，关野贞在冀、晋、豫、鲁、苏、浙等地进行广泛调查。

——1919年，桑志华在林西、赤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920年，桑志华首次在甘肃庆阳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面包含了許多痛苦的记忆，在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考察和探险活动中，我们失去了难以胜计的珍宝，它们至今还堂而皇之地躺在域外各处的博物馆里。

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沉沉甸甸的收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中国国土上的考古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拉开了序幕。

从1920年起，北洋政府开始主动聘请外国学者和国外学术团体进行联合考古工作，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就是在这前后来到中国的。安特生首先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类化石地点，又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仰韶村遗址，接着在甘肃和青海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

中国学者中也有了主持田野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中国人第一次主持的田野考古